

# 埃及经济发展战略 及发展模式的历史考量<sup>\*</sup>

王 泰

**内容提要** 从经济发展战略演变的角度考察，20世纪五六十年代，埃及形成了在“阿拉伯社会主义”原则指导下以“国有化”为基础和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七八十年代，逐渐调整为扩大私有化、缩小公有化为特征的“混合型”经济发展模式；90年代以来，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埃及经济发展模式开始全面向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转型。埃及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变与埃及经济发展战略形成互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埃及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和转型受到美国，以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同时与埃及政治体制的变革密切相关。

**关键词** 埃及 经济 发展战略 模式

**作者简介** 王泰，内蒙古民族大学副教授、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生（通辽028043）。

1952年七月革命是现代埃及历史发展的里程碑，自此埃及人民完成了从19世纪以来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的历史任务。半个多世纪以来，埃及政府和人民在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为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付出了艰辛努力。本文拟从埃及经济发展战略50多年演变的视角，对埃及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调整、转型作历史的考察和分析。

## “社会主义”发展战略与国有化模式的形成 (1952~1970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1956年纳赛尔全面执掌埃及政权的时期，除了政府严格控制的水利灌溉业和少数需要保护的出口工业（例如纺织业）之外，埃及国家经济体的特征仍然是财产私有制和自由企业经济相结合，延续了战前埃及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20世纪50年代初，虽然棉花价格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朝鲜战争的影响，但埃及经济稳定增长、通货膨胀率较低。这一方面得益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埃及工业的增长，另一方面也是实施一系列政策的结果，包括关闭亚历山大棉花交易所，提高对非基本消费品征收的直接税和进口税，等等。<sup>1</sup>

<sup>\*</sup>本文为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不同模式研究”和内蒙古自治区高校科研项目“埃及文明的演进与现代化进程”的阶段性成果。

<sup>1</sup> See Edited by M. Riad El-Ghonemy, *Egyp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hallenges for development*. London and New York 2003. p. 75.

受当时国际上两种意识形态竞争的影响,从1956~1970年纳赛尔总统去世,埃及进入全面的经济调整时期,埃及社会经济的发展,选择了具有浓厚“社会主义”色彩的经济发展模式,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首先,以纳赛尔“阿拉伯社会主义”为指导方针。<sup>1</sup>1955年3月,纳赛尔在接见印度记者时首次提出在埃及建立社会主义的主张。12月5日,纳赛尔在埃及合作社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布在全国建立一个“民主、合作的社会主义”社会。1962年,由纳赛尔主持制定的《民族宪章》(亦称《全国行动宪章》)中确认埃及信奉社会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1964年,临时宪法继而明文规定埃及的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

纳赛尔倡导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对埃及经济现代化的指导性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1)社会主义是促进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唯一出路<sup>④</sup>、是促进社会解放的道路、是“解决埃及问题唯一革命的决策”<sup>④</sup>。纳赛尔认为,不发达国家消除落后的唯一方法就是实现社会主义。(2)“社会主义是建立在正义和满足需要的基础上的”<sup>1/4</sup>。按照纳赛尔的看法,“富足”指生产和发展;“正义”指社会公正和分配公正。二者的关系相辅相成。没有富裕的正义意味着分配贫困,没有正义的富足意味着增加财富的集中。<sup>1/2</sup>(3)关于剥削所有制和非剥削所有制的区分问题。纳赛尔主张由人民控制一切生产资料,但不必废除私人所有制。纳赛尔认为:“应由人民掌握所有生产资料,根据预定计划决定利润的处理”。但他又指出:“所谓由人民控制一切生产资料,并不是指生产资料都要实行国有化,取消私有制,也不是侵犯私有制合法的继承权。”<sup>1/4</sup>当然,纳赛尔并非拥护剥削阶级所有制,他坚决反对“剥削阶级所有制”,说他只允许不剥削他人的私营部门存在,为发展总计划作出贡献。

其次,实行社会主义的土地改革。按照上述纳赛尔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为减少贫困和机会不平等,埃及新政权所采取的主要措施就是打击腐败、扩大对低收入者的安置,以及从1952年9月起进行土地改革,继而在1961年进行了第二次土地改革。通过土地改革,对全部农业用地的13%进行了重新分配(分配给那些占地不到2费丹的农户)。此外,政府没收了王室土地,且降低了土地租金。这样,就在埃及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限制地主占有土地的最高数额,1952年第一次土改时为200~300费丹不等,到1961年降为100费丹。尽管这只是相当缓和的土地分配,它还是促进了埃及社会政治结构朝着更为平等的方向改变。但是从性质上说,埃及财产所有制的私有性质,以及社会经济以私有为主导并没有发生改变。<sup>③</sup>

再次,全面推行国有化政策、实行计划经济,推行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土地改革,特别是苏伊士运河战争的胜利,使纳赛尔总统扩大了对全国经济的战略控制。其主要特征即加强投资的计划性、推行大规模国有化、实行行政主导价和固定工资,同时严格控制对外贸易和农业资源的利用。实施进口替代战略,推动了外贸和生产的发展。埃及的发展模式逐步由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转变,目的不仅是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年均7%的增长率,还要实现建立在稳定基础(财富在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公平分配,以保护工人和穷人的利益)上的埃及人的全面发展。

在国有化方面,到1963年,从国有部门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在国家经济各部门中所占比例看,工业和电力部门达60%,交通部门达75%,不过它在农业部门只占6%。国家已经控制82家私有公

<sup>1</sup> 参见唐大盾、张士智等著:《非洲社会主义:历史·理论·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96~119页。

<sup>④</sup> 参见纳赛尔:《独立的翌日》,转引自上海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上海社会科学院情报所合编:《当代亚非拉社会主义思潮资料选译》,1982年版,第141页。

<sup>④</sup> 同上书,第138、139页。

<sup>1/4</sup> 同上,第138页。

<sup>1/2</sup> 参见杨瀛城、江淳著:《纳赛尔和萨达特时代的埃及》,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91~92页。

<sup>1/4</sup> 纳赛尔:前引书,转引自《当代亚非拉社会主义思潮资料选译》,第140~141页。

<sup>③</sup> See Edited by M. Riad El-Ghonemy, op. cit., pp 75-76.

司将近一半的资产。政府就业快速扩大,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公有部门享受工资的工作人员占全部享受工资工作人员的一半。通过劳工立法,从事非农产业的工人也得到了很多好处,包括提高每日最低工资标准、降低每周工作时间、享受带薪假日、义务社会保险和免于非法解雇,等等。这样,上述具有浓厚社会主义色彩的战略促成了社会全面就业。它证明了在埃及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采取多项措施是可以创造大量就业岗位的。随着逐步扩大免费的公共服务部门的范围,一个福利国家的雏形初步显现。

总的来讲,缩小贫富差距、推行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并且没有出现官僚腐败现象,被认为是纳赛尔时期埃及经济发展的重要成就和特点。<sup>1</sup>不过,与上述成就相伴随的则是冗员过多、效率低下、持久的隐性失业,以及经济管理机构的中央集权化,使少数管理者管理着大型国有企业,他们成为了经济机构的精英,处于中央经济控制的核心地位。

另外,由于1961年埃及的棉花生产锐减;支持也门战争(1962~1967年)及参加1967年中东战争,把原拟投资于商品生产的资金用于购买武器装备;美国停止援助,以及苏伊士运河和旅游业收入减少等因素,致使纳赛尔计划的埃及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的目标没有达到,在第一个经济计划时期(1959~1964年),年均增长率达6%,到20世纪70年代降为3.5%。<sup>④</sup>

## “开放经济”战略与向“混合型”经济模式的过渡 (1970~1991年)

1968年7月1日,埃及官方的《金字塔经济学家》专刊上发表了纳赛尔总统制定的有关经济改革的重要文件和报告,计划在政府部门、国营、私营企业和合作企业进行经济与财政改革。<sup>(四)</sup>

十月战争后,萨达特总统决定埃及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主要内容体现在1974年官方发表的“十月文件”中。该政策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该政策旨在引进阿拉伯国家及其他国家的资金和技术,利用外资和外援发展埃及国民经济。同时动员本国资金投入,发挥私人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以活跃经济,增强国力。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建立合营企业,引进外资并实行优惠政策,改革对外贸易体制,从双边贸易向多边贸易发展,实行进口自由化。

具体而言,即在坚持中央计划和国有部门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放松对进口和国内贸易的限制。其结果是消费品的进口从1960~1970年间年均增长率不到1%上升到1970~1975年的15%,而进口汽车在同期则增长了30倍。因此,萨达特总统这一时期实行的开放又被称为“消费型开放”。随着1973~1979年石油价格的飙升,石油出口(几乎是1966年的10倍)和侨汇收入(是1961~1970年平均水平的近8倍)有所增加,但同时加剧了通货膨胀。这一时期,政府仍旧是制造业和电力部门的资源分配者、社会服务和粮食的主要提供者。

从1981年10月萨达特总统遇刺到海湾战争之前,穆巴拉克总统把发展国民经济作为中心任务,对埃及发展战略做了局部调整,最大的变化为:确定了把“消费型开放”变为“生产型开放”的总政策方针,鼓励并引导外国资本和本国私人资本向生产项目投资,以加速埃及工农业的发展;同时改进国营企业经营管理,继续放宽对私营部门的限制;调整外贸政策,鼓励出口,限制进口;重视发展农业,继续将沙漠改造为农田;紧缩开支,抑制消费;加强外汇管理,增加外汇收入;改变过分依靠美国提供援助的做法,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经济技术合作。这些政策取得了一些成效:在吸引外资用于生产性投资方面有较大的进展,到1988年,仅阿拉伯国家对埃及70多个项目的投资就达

<sup>1</sup> See Fouad and Barbara Ibrahim, *Egypt An Economic Geography*, I.B. Tauris London and New York, 2003, p. 94.

<sup>④</sup> Edited by M. Riad El-Ghony, op. cit., p. 78.

<sup>(四)</sup> 参见王宝孚:《埃及经济改革开放的成就、难题和前景》,载《现代国际关系》,1996年第5期,第35页。

35亿美元；从国外获取了大量赠款、贷款和先进技术；社会消费有所压缩，1985~1986年度，社会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比20世纪70年代中期减少了3%~5%。

总的来讲，从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到80年代，埃及处在一个各种经济模式交织的时期。经济增长的主要指标都高于一般发展中国家。1970~1979年，埃及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7.6%，工业年均增长率为7.8%，制造业为8.2%，人均收入的年增长率为6.7%。1980年，埃及国内生产总值达221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523美元。随着西奈半岛油田回归，以及油价迅速攀升，埃及在这一时期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石油出口国，70年代后五年经济增长达到9.6%。石油占埃及全部出口商品的75%，传统的主要出口商品棉花从45%降到7%。<sup>1</sup>此外，政府还可以从石油公司那里得到大量租金。随着阿拉伯石油出口国家对外国劳工的大量需求，埃及的侨汇也开始迅速增多。1980年，石油、侨汇、苏伊士运河与旅游业的收入分别为30亿美元、27亿美元、10亿美元和6亿美元。1973~1980年，埃及国内公共投资约增长26%，私人投资增长78%。新的外国私人投资（非石油部门）也从1977年的1亿美元增至1980年的4亿美元。<sup>④</sup>

但石油经济的繁荣并没有持续长久，1990~1991年度出现衰退，这一时期后来被称为“不稳定的发展”时期。据世界银行统计，1965~1980年，埃及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为7.3%，1980~1990年降为5.4%。<sup>④</sup>主要表现在实际人均收入下降20%，从1986年的750美元降至1989年的640美元，1990年继而降至600美元。外债增至140亿美元。<sup>④</sup>高达20%的通货膨胀率（1987~1991年）直接导致市民实际生活消费额增加和收入减少，同期大约降低25%。同时，由于政府严格控制稀缺资源的再分配，以及对消费品的补贴，再加上与经济开放政策相关的一些法律漏洞，使腐败现象开始在政府机构和国有部门迅速蔓延。

## “改革调整战略”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 (1991~2005年)

由于积极参加1991年海湾战争，战争结束后，埃及得到了西方国家（美国和巴黎俱乐部成员）以及阿拉伯国家的经济援助和债务减免。同时，在美国施加的压力下，埃及同意进行“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计划”（ERSAP），试图通过全面走向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来应对日益临近的全球化挑战。

“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计划”并不是为埃及提供可供选择的其他经济发展模式，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为埃及经济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美国式资本主义模式的倡导者。<sup>⑤</sup>“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计划”主要包括短期稳定计划和长期结构调整。短期稳定计划主要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进行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改革（削减政府支出、货币贬值、无需考虑收入分配提高税收，降低实际工资和利率自由化，等等）。其目的是降低公共和私人消费（即降低需求政策），由此产生的高储蓄直接用于投资，主要是私人企业的投资。结构调整主要由世界银行负责，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政策，提高资源分配效率（特别是商品生产部门的内部供应）。两项计划彼此促进、互相交叉。

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长时期谈判后，1987年5月，埃及政府决定采取包括五年计划（1987~1991年）在内的一揽子稳定政策。埃镑贬值几乎达100%，从1987年1美元兑换1.36埃镑降至1989~1990年度的2.60埃镑。政府还采取措施，降低占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16%的预算赤字

<sup>1</sup> Edited by M. Riad El-Ghonemy, op. cit., p. 79.

<sup>④</sup> 王宝孚：前引文，第35页。

<sup>④</sup>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2004, 50th edition, Europa Publication, England, 2003, p. 322.

<sup>④</sup> Edited by M. Riad El-Ghonemy, op. cit., p. 80.

<sup>⑤</sup> See *ibid.*, p. 80.

(1987~1990年),包括取消电、油、交通等非食物补贴,削减食物补贴等。

“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计划”分阶段有步骤地进行,1991年7月~1993年9月为第一阶段,以财政金融改革为主;1993年10月~1996年10月为第二阶段,以巩固宏观经济、初步开始结构调整为主;1996年10月~1998年9月为第三阶段,以巩固已经取得的宏观经济稳定、扩大和深化结构改革为主。

“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计划”在宏观经济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使埃及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得以恢复,在1998~1999年度达6.0%,但是按照1996年价格计算在2000年又回落到4.9%;通货膨胀率、预算、财政支出和全部外债急剧削减,但包括政府和国有企业所欠的全部内债仍然很高,在2000年仍达到1740亿埃镑;外汇储备(包括黄金)急剧增加,从1991年的38亿美元增加到1998年的195亿美元,但在2000年降为145亿美元;随着国有部门私有化进程的推进,外国直接投资由1991年的1.4亿美元猛增到1994年的12亿美元,到2000年增加到16亿美元。但从总体讲,该数值仍然很低,只占埃及全部私人投资的4.5%、国内生产总值的0.5%~1%的规模。<sup>1</sup>

为了使经济全面走向市场化和应对全球化挑战,埃及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加大了私有化的力度,主要涉及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和鼓励私营企业投资于传统上由国有企业控制的基础设施行业。1991年颁布的第203号新《国营企业法》标志着埃及国营企业私有化的开端。据此法令,国有企业的投资和信贷不再纳入政府财政预算,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地位相等,允许国有企业清算资产。1996年詹祖里新内阁把通过私有化加大吸收外资的力度作为政府的头等大事,私有化的步伐明显加快。到1999年底,已经出售股份的公司达129家,私有化收益累计124亿埃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5%。此外,埃及政府将私有化的范围扩展到基础设施建设,把国内私人投资作为新建港口、电信、发电站等大型项目的主要投资来源。

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采取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力求融入全球经济是埃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既定目标,因此,埃及市场改革和发展战略的另一个重点是建立一个更开放的、外向型的贸易体系,实现埃及的贸易自由化。埃及进行的削减关税、减少非关税限制、增加贸易透明度的改革取得了明显效果。关税削减幅度最大的达到50%,1989~1996年平均法定关税降低了20~28个百分点。1996~1998年多次下调税率,逐渐减少进口附加费。此外,埃及还在1998年1月取消了对纺织品进口的禁令,2001年1月取消了对服装进口的禁令。同时,埃及还承诺逐步取消对农产品进口数额的限制。

当然,“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计划”还存在诸多不足,例如实行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战略仍然受到体制性的瓶颈制约,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贸易自由化政策过多地集中于进口,而不是出口,使埃及的制造业在全球竞争中明显处于不利地位;尽管内外债大幅减少,但仍是沉重负担,私有化进程依旧缓慢。另外,“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计划”增加了埃及的失业率,严重伤害了埃及低收入者的利益,在城市中产生了新一批的贫困者群体。根据2002年2月官方公布的数字,埃及失业人口在进入新世纪后进一步增多,其比例由2000年的8%上升到2002年的9.1%,失业人口相应地从150万增至180万。专家指出,如果只靠货币政策(利率、汇率、控制通货膨胀),而不是增加资本支出来吸纳新增的劳动力,埃及将面临严重的社会问题。加强人力资源培训,加大对一些新兴行业和地区的开发力度,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尤为重要。

面对近几年埃及经济持续低迷(经济增长率基本维持在3%左右的较低水平)的现实,埃及政府接连在2004年7月和2005年12月两次重组内阁,改革派经济学家纳齐夫出任总理,肩负起振兴埃及经济的重任,显露出埃及进一步加大经济改革的决心。埃及由此进入“第三代经济改革”,它“依据一种全新的思想展开,也就是要紧跟全球经济形势发展的步伐,增强国家与公民间的合作与互信,

<sup>1</sup> Edited by M. Riad El-Ghonemy, op. cit., p. 81.

为民营企业提供机会，使民营企业从需要支持与指导的小型经济伙伴转变为具有吸引投资、促进就业、创收，以及制定并执行政策的全面能力的经济伙伴”<sup>1</sup>。包括一系列税收、海关和金融领域的改革。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05 年 9 月发布的半年度报告，2005 年埃及经济增长率约为 4.8%，2006 年约为 5.2%。埃及的私有化进程实现了稳定和发展的双重目标。<sup>④</sup>

## 对埃及经济发展战略与发展模式转型的思考

通过对埃及经济发展战略 50 多年演变的考察，可以看出，埃及经济发展模式经历了螺旋上升式的发展和变化。其中有 3 个特点值得关注。

首先，埃及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变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形成互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经济发展模式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相适应，经济发展战略的改变导致经济发展模式的改变；反过来，发展模式也影响到发展战略的调整。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埃及发展战略的主要目标是巩固七月革命的胜利成果，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改善民生。正是这样的战略要求使埃及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国有化道路，尽管它被赋予了浓厚的阿拉伯特色，但依然是当时解决国家发展资金、大规模集中和动员社会力量行之有效的方式。到七八十年代，埃及发展战略转向实施“开放政策”，解决纳赛尔时期埃及社会显现的一系列弊端，相应地形成了公有制和私有制的“混合型”发展模式。90 年代以来，为应对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种种挑战，埃及发展战略有重大的调整 and 变化，加快了向市场化和私有化转换的步伐，这个过程没有结束，仍然处于艰难的探索、调整时期。

其次，埃及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变是一个内部自我探索和外部施压互动的历史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因的影响和制约。冷战时期，受美苏两大集团争夺，以及与以色列冲突的影响，埃及的发展受到外部因素的严重干扰。纳赛尔时期依靠苏联援助，萨达特执政后转而投靠美国。穆巴拉克总统在后冷战时代则进一步加强与美国的战略关系，埃及现在仍然是美国继以色列之后的第二大援助国，西方和阿拉伯国家对埃及的债务减免数量可观。埃及的改革长期承受外国政府（特别是美国）施加的压力，并且由国际借贷机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支配，这使埃及在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上困难重重，问题颇多。

最后，埃及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能否成功也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效能。一方面，自由市场经济、减少国家干预、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削减补贴、增加税收等措施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欢迎。世界银行在其 2005 年下半年发布的一份有关各国投资环境的评估报告中认为，埃及是 2004 年全球实施经济改革力度最大的 6 个国家之一。<sup>⑤</sup>但另一方面，由于历史原因，埃及经济发展一直面临体制性难题，例如埃及政治控制和威权主义对经济的影响依然强大，由此使私有化进程缓慢、官僚体制效率低下、部分政府官员的腐化状况严重，等等。政治改革的步伐缓慢，不能有效刺激经济发展等体制性问题从根本上束缚着埃及经济自由化发展模式的形成。因此，埃及能否最终形成具有地区特色的某种伊斯兰发展模式，<sup>⑥</sup>乃至埃及能否真正走上可持续发展的振兴之路，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各项改革措施。

（责任编辑：樊小红 责任校对：徐拓）

<sup>1</sup> 埃及驻华大使馆新闻处：《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年鉴》（2005 年），第 69 页。

<sup>④</sup> 详见埃及新闻总署编：《埃及》杂志，2006 年第 40 期，第 8~9 页。

<sup>⑤</sup> 参见新华社开罗 2005 年 12 月 31 日讯。

<sup>⑥</sup> 详见 [美国] 霍华德·威亚尔达主编；董正华等译：《非西方发展理论——地区模式与全球趋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 96~113 页。

## Africanus Horton, a Pioneer of African Nationalism

Zhang Hongming

pp. 26– 31

Africanus Horton was an intellectual much in controversy in modern African history. He had won praises and disparages not only from people in his time but also those after. Horton became the most reproached thinker of the modern African intellectuals for his unrealistic illusion o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his affirmative attitude towards colonialism. Some criticized Horton as one who had been contam-

inated by the west culture to an incurable degree; one absolutely refused to repent and the black-skinned Britishman. But some viewed him as the west African scientist, a patriot, a pan-Africanist, a pioneer of the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west Africa, “guarder of African dignity” and “father of modern African political ideology”.

## On the Function of Islamic Political Culture (2 of 2)

Liu Yueqin

pp. 38– 43

The Islamic political cultur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law and supplement each other. The legal culture is included in the political culture, which is presented as legislation of the Koran, the religious law, the civil law and the criminal law. The religious law is to some extent a strong prop to the Islamic political culture. The thought of the Islamic political culture first stemmed from the Koran and then impenetrated the civil law, the criminal law and the others. The sense of Allah being Allah and man being subject to Allah and the Herald became the political ideology of the political cultural monism,

hence to form the foundation, core and dominant mentality of the Islamic political culture. The Islamic culture is interlinked with the religious ideology characteristic of the sense that Allah is the supreme unique. In conformity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modern Islamic culture, the Koran and Hadith were respected as the core of culture and complementary of the law. The political capacity of the Islam shares the origin of the modern Islamic movement. As a whole, the Islamic can win any democratic elections so long as they are held, which is usually in the effect of Dominos.

## A Historical Study on the Economic Model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Egypt

Wang Tai

pp. 44– 49

Reviewing the evolution of Egypt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under the principle of the Arabian Socialism,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emerged in Egypt between 1950s and 1960s based on and characteristic of the “nationalization”. In 1970 and 1980s, the model was steadily adjusted to be the “mixed” characteristic of expanding privatization and reducing nationalization. Since 1990s, when being confronted with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Egyptian model began to transit towards that of privatization, market and liberalization. Egyptian economic model had interacted well with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hases of Egypt. The formation and transition of Egyptian economic model had been influenced by the external factors a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World Bank and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hile connected with the political system reforms in Egypt.